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变迁及其 冲突性特征

王为¹

(1.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经历了结构性的变迁,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发生了转变。这种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是伴随政治转型的发生而完成的。政治转型初期政党竞争的方式及其对社会的政治宣传,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之间的敌视心态与对抗方式传递给社会,使台湾社会出现“争议政治”,凸显其冲突性政治文化的特征。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加剧最终势必摧毁台湾的政治发展,故政治文化的改造问题须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 政治文化结构; 冲突性政治文化; 政治转型; 政党竞争 “公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2(02)-0013-08

台湾作为政治转型社会,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政治冲突严重化的特点,表现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立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泛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对抗。通过剖析这种政治关系和广泛存在的冲突现象,不难发现,台湾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性特征。^①冲突性政治文化概念源于西方政治学界对政治文化分类及引申。最初由美国学者莫里斯·阿尔蒙德(Morris Almond)等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并指出在较高政治认同基础上将可能避免社会政治冲突的发生。此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教授沃尔特A. 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在其所著《政

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书中提出对政治文化的分类——碎分化政治文化(fragmented political cultures)和整合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integration)。“过渡社会”普遍表现为碎分化文化类型,即:①对地方的政治忠诚高于对国家的政治忠诚;②对控制冲突缺乏被广泛接受且可操作的民事程序;③社会组织之间的政治不信任普遍存在;④国家政府组织结构和持久性方面趋向于不稳定;⑤此种政治文化往往导致政治分裂和冲突的出现。而“整合的政治文化”则表现为:①相对稳定的统治政治一致性;②较低程度的政治暴力和民事程序在冲突处理中占据首

收稿日期:2011-08-24; 修订日期:2011-12-19。

作者简介:王为(1960—)女,天津人,外交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

^① 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在对政治转型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碎分化政治文化”分类标准,其中着重分析冲突现象,如美国学者鲁恂·W. 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安·莫斯利·莱施《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本文正是沿用这一分析方法对台湾政治文化特征进行阐述。另外,中国学者王沪宁在其著作《比较政治分析》中提出“冲突型政治文化”和“协调型政治文化”的分类。

要地位;③在社会团体中不断加深的政治信任;④对政权比较强烈而持久的忠诚等。台湾社会复杂的历史和政治演变促使其形成多元的政治文化结构^①,并且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认知和思想情感,这是构成各个政治行为体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重要动因。因此,对台湾社会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意义的。

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是其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同时,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又可能成为其政治文化积累的重要过程。台湾政治文化的形成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而在政治转型的重要时代变迁中,其政治文化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特殊的政治经历和普遍性的社会政治行为也逐渐构成其政治文化中的补充性内容,从而对原有的政治文化体系形成冲击。这是构成当今台湾社会政治冲突的深层原因;而且,台湾政治状况的改观也势必需要从政治文化改造开始。

一、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

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经历了结构性的变迁,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位置发生了置换。这一变迁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原来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主体转变为以台湾本土政治文化为主体的结构。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其政治文化结构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始终是台湾政治文化的主体。历史上,中原文化输入台湾主要是通过大陆移民的迁徙运动完成的。特别是从明初天启年到清朝嘉庆年多次发生移民潮,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群众移民至台湾,构成了台湾社会主要的人口基础。^②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容逐渐输入台湾社会,并自然延续下来。诸如“权力本位”、“大一统”、“宗法观念”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在台湾也是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台湾社会还兼容多种中国其他区域文化

特点,如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文化,加之台湾本土文化,形成台湾多元文化的新面貌。

但是,特殊的历史演进促使台湾社会生成本土政治文化,这就是“台湾意识”。16—17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出现重大改变,满族人入关并建立清朝政权,再次撼动了以汉族政权为统治主体的政治格局,由此引发了对于统治者权力正统性的质疑。从1626—1644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北清南明”的特殊历史过程。这段历史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尤为重要,台湾成为一些原明朝将领、士大夫等聚集、发动反清复明斗争的基地。台湾军民坚持抵抗清政府强悍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承受着政治危机,充满了不安全感。“个人的认同问题常会受到缺乏安全感的催化,并以不同的方式与族群认同的感情交互作用。”^③“台湾意识”正是在这种政治变迁的压力下形成的一种群体认同。它强调台湾的主体性,表现出对中央政权的强烈排斥。产生于危机之中的政治情感,充满悲情色彩,因游离于中国主体社会之外而凸显群体孤独;台湾社会共同体验了强烈的挫败感以及由挫败带来的压抑,因此在抵御强敌的同时,也需要共同抵御心理的极大恐慌。整个社会通过强调台湾是命运共同体来凝聚共同信心,上层领袖需要以此集结社会民众的力量,而台湾民众则需要以此作为情感依托,相互慰藉。“台湾意识”得到台湾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持。

“台湾意识”有着复杂的内涵。最初它表现出爱国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了抵抗强权政治、团结自救的意志。但是,由于它具有明显

^① 所谓政治文化结构即指一个社会主体政治文化和非主体政治文化的格局及其关系。台湾多元政治文化中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等内容。参见王为著《台湾地区政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林国平主编《文化台湾——中华文化在台湾》,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③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的地域认同观念和强烈的自保意识,从而衍生出对母体的排斥和不信任。而且,就政治文化结构而言,“台湾意识”只是一种亚文化结构,尽管它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冲突的某一方面,但它无法取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地位,仍然是在中国政治认同基础之上产生的本土化情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是台湾政治文化的基础。

19世纪末期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遭遇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冲击,每次冲击的结果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遭到剥离和侵蚀,台湾本土政治文化被强化,台湾原有的政治文化结构开始发生动摇。第一次冲击,是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台湾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日本,此后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社会又一次经历政治危机。日本统治者对台实施全面的殖民政策,企图将台湾变为日本的一部分。其中,“皇民化”运动可谓是彻底的文化殖民,日本通过采取强制性措施对台湾社会教育、文化、生活风俗等进行全面管制,试图改变台湾社会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内核,全面割裂台湾与祖国的血脉联系。“皇民化”运动特别强调对青年实施强制同化和军事训练,把台湾纳入日本“圣战”计划之中,因此,此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皇民化”运动是对中国社会内在文化联系的血腥撕裂,经过长期的奴化教育和训练,台湾社会一定程度上陷入某种政治认知的混乱,由此强化了台湾对祖国的疏离感。在此过程中,“台湾意识”作为区别于宗主国思想文化统治的台湾社会集体认知符号进一步得到强化,以致于在日本投降后,一些人开始宣扬“台独”思想,谋求台湾独立。

第二次冲击是国民党退台后推行“反共复国”、“反攻大陆”的战略计划。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在台湾实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植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但同时又强化意识形态对立,通过反共宣传等手段,对台湾社会输入政治敌对观念,促使台湾民众产生对大陆的政治排斥,曲解、恐惧和敌对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取向。20世纪70年代,随着“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台

湾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被边缘化,国民党对台湾社会营造的“中国梦”逐渐远去,台湾民众转而追求实现“台湾梦”。这一转变过程客观上却促使台湾社会产生对中国国家认同与对“中国”实体认知的错位。总之,对中国政治主体的认同越来越模糊,而“台湾意识”却在不断强化。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是伴随政治转型发生而出现的。1987年,台湾解除“党禁”、“报禁”,取消“戒严体制”,标志其政治转型的完成。此后,台湾进入政治开放的发展过程,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趋向开放,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达成分享权力的共识,并形成一定的分享权力机制,多党政治形成。此外,政治过程趋向开放,各种政治行为体自由参与政治过程;社会新闻媒体和政治信息逐渐开放,以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显然,政治开放客观上促使政治竞争合法化,但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台独”政党合法化,“台独”言论合法化。在政治竞争过程中,民进党凭借曾经反对独裁统治的资本以及反对政治腐败等现实诉求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支持;同时,它的政治优势还体现在其“本土”属性和大众化的悲情主义情感表达,以此唤起本土民众的认同。正如阿尔蒙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具有政治冲突的政治系统中,某些政党就是亚文化结构的创造者,它们和主体政治文化形成相对立的观念,并在推行政党价值理念的过程中推动了亚文化地位的提升。民进党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台独”路线和“台湾意识”在价值上的重叠;而国民党则在不具备本土属性这一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快速实现政党政治理念的转变,提出“台湾政治共同体”、“台湾利益优先”、“两岸分治现状”等,表示对“台湾意识”的接纳。特别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曾经提出“两国论”,表明国民党内部也一度出现“台独”主义政治路线。显然,两大政党都在往“本土化”文化靠拢,以争取自身代表台湾的合法地位。这样,“台湾意识”在政党意识形态的争斗中不断被强化,作为亚文化结构逐渐占领了主体政治文化结构的位置。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导致台湾社

会政治认同的偏移,同时也导致台湾社会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混乱与矛盾。从现实情况看,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身份认知不被承认,其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自身的身份认知和国际社会对台湾身份正式的承认之间存在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台湾社会的敏感神经,形成其内部的情感挫折与焦虑,并由此引发对母体的排斥、分离和各种形式的泄愤,包括在其社会内部引起的不同群体(族群)之间的争执和斗争。

二、冲突性政治文化特征的 凸显及影响

政治文化是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制度、政治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促使人们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普遍观念,其中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等层面。而基于人们普遍的思想观念所体现的具有一致性和相对稳定的典型心理倾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的特征。总体说来,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性,人们的基本政治认同度较低,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观念、情感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矛盾。反应在政治行为上,则表现为倾向采取对抗、攻击,甚至暴力性的行为,由此出现冲突、分裂的政治、社会关系。台湾冲突性政治文化特征的形成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如前所述,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政治认知混乱和矛盾,政治认同度降低,政治观念冲突普遍化;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政党政治竞争加剧了社会政治对立,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情感和价值的冲突。

历史总是构成政治文化价值信息潜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曲缓波平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延续。^①台湾社会曲折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促使其政治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变迁并非自然演变的过程,而是在外国列强侵略、政治分裂与动荡的状态下,台湾社会一次次被强行与母体文化割裂的过程中形成

的,“台湾意识”取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台湾政治文化的基本认知和情感趋向。在缺乏普遍的政治认同的社会,泛意识形态化易于取代基本的价值认同,^②且可能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互不信任、情感对立等心理反应,所有这些构成导致社会分裂的潜在因素。

从现实来看,台湾政党竞争模式是强化其政治文化冲突性特征的直接原因。政治竞争作为外来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被逐渐植入台湾社会的。作为民主政治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强调政治权力合法性必须通过竞争(竞选)来确立,每个社会个体或政治组织都有权利争取政治权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兴起,政治竞争观念广泛传播。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党外势力,以争取社会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基本诉求发动民主运动,从秘密的社会宣传、鼓动到走上政治前台公开参加竞选活动,最终与国民党当局形成政治博弈之势,并达成一定的政治妥协。此后,多党政治竞争合法化,并成为台湾政治常态。

首先,政党多元化对台湾政治文化结构变化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政党作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其政党文化必然构成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结构。政党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会形成对社会的思想倾向和价值体系的影响或引导。一种与主体政治文化相排斥的亚文化结构的存在,势必形成对社会分裂的推动。“……在亚文化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连续性,能使集团之间产生疏离感。如果再加上冲突的经历,这种疏离感更是得到强化,而很容易支持一种政治上持敌视态度的亚文化。”^③“台湾意识”的强化就表现在它从本土情感出发,对“台独”政党和“台独”路线具有相当程度的容忍和支持,从而使台湾社会亚文化和政党亚文化达到

^① 王沪宁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② [美]鲁恂·W. 派伊著,任晓、王元译《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③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重叠或交融,形成强悍的影响力,甚至取代传统主体政治文化。

其次,政党竞争的方式对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形成也起到关键作用。台湾在实现多党制之后,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是其主要政治分歧,与其说政党之间的冲突是由意识形态的矛盾、对立而引发,不如说是由于彼此存在着政治对抗的心结所致。因此,台湾的政党制度以及主要政党之间的互动行为模式都成为冲突性政治文化的重要推手。谈及政党之间存在的政治心结,自然要追溯到威权统治时期“党外势力”在政治高压下生存,形成了强烈的反体制观念以及政治对抗情绪。虽然在政治转型之后,原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已经变为多党政治,政党之间平等竞争关系理应形成。然而,国民党与民进党早期形成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改变,反而在不同政治利益驱使下不断加剧,“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就会随之而来”^①。因此,两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不是在政策层面上,由于偏见和敌视引发的政治心结成为其政治矛盾的主要根源。于是,台湾的政治竞争中政党冲突、对抗无所不在,特别是这种政党冲突往往带有非理性竞争的成分,为对抗而对抗的偏执和利己性致使政党陷入恶性竞争,相互攻讦、报复,全面对抗。“集团间的敌视会因不断冲突而加剧,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细小的问题也很容易使这种弥漫的敌意化成愤怒和暴力……各集团间的疏远和敌视感很可能造成政治冲突,甚至会使相对来说是例行的政治决策过程难以进行。那些真正厌恶和不信任其反对者的精英人物很可能越过通常进行讨论和友好磋商的渠道。”^②从近20年台湾各种重要公职选举看,民进党显示出良好的竞选成绩,完成从非法政党到在野党、再到执政党的地位变迁。但同时,民进党政治叛逆性格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始终不曾改变,在民进党强劲攻势下,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则显得被动、反应迟缓。它不得不再调整竞争策略应付民进党,同民进党争

取台湾本土资源,通过政策调整适应台湾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同时也要极力采取对抗手段,由此,政党之间的不信任日趋加剧,政治冲突频繁出现,形成了某种固化了的、并不利于良性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通常说来,政党的行为模式和关系模式也会逐渐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进而成为一种竞争文化。而冲突性的政党关系和互动模式显然强化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冲突性。

同时,这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对塑造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党作为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在执行社会化功能过程中,不仅向社会民众传导其政治态度、利益取向及价值观念等,而且也将政党关系及其行为模式传导给社会。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党往往利用亚文化上的分裂,把潜在的分歧变成公开的政治问题;正是政党领袖把新的、有分歧的问题带到政治生活的前沿。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及斗争对社会民众会形成意识形态化的引导,促使其产生严重倾向化的政治选择。围绕两大政党聚集成泛蓝、泛绿两大社会阵营,使台湾社会形成政治割据状态,因此,政党完全充当了社会分离力量。同时,尖锐对立的政党也势必将解决政治歧见的极端方式带给社会,对抗、暴力等行为逐渐具有普遍性,甚至变成某种文化形态,于是,台湾社会出现“争议政治”。所谓“争议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学者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Orum)提出的概念,它是指“聚众、集结及其他公众集会的形式”^③,对于政治集团(政党)而言,不断挑起利己的争议性议题无疑是维持自身地位的有力手段。也就是说,这些政治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争议政治”基础上的,“争议政治”成为一种需要。而且,“争议政治”具有循环周期的特性,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始终处于历

^①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0页。

^②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③ [美]安东尼·奥罗姆著,张华青等译《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34页。

史变迁之中,不断累积的政治矛盾对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直到80年代末政治转型,政治公开的条件促使出现“争议周期”,各时期累积下来的政治矛盾一并爆发。在政党的影响下,民众也倾向以激烈的对抗性方式实现政治参与。

此外,冲突性政治文化还会促使形成另一种社会负面心理,一些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信任,对政府失去信任,甚至表现出政治冷漠的态度,排斥、拒绝政治参与的状况也普遍出现。

总之,政党恶性竞争强化了台湾冲突性政治文化,政党的理念、行为方式等通过社会化过程不断传导于社会民众,形成泛意识形态化的对立,政治分裂与冲突不断发生。而这些势必无情消耗台湾民主化转型所累积下来的政治资源,摧毁其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因此,冲突性政治文化必须加以改造。

三、台湾社会冲突性政治文化的改造

提出台湾政治文化改造的命题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考:其一,在政治文化结构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促使冲突性政治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即是政治集团的力量。特别是在政治转型时期,主要政党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功能性作用体现了它们所具有的对政治文化的引领功效。通常说来,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不仅折射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因此,政治文化的内容确实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从而调整和改造社会政治关系也就可能意味着对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其二,台湾社会冲突性政治文化造成了政治发展的困局。一般说来,民主政治发展具有这样一些重要方面:民主制度、公民社会及“公民文化”。台湾经历政治转型之后,民主制度已逐步建立,宪政制度框架基本确定。但是,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就需要具备“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公民文化”的完善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两者的互动

既涉及民主政治发展品质的问题,也构成区别民主制度运转良好与否的标准。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完善的“公民文化”无疑是保障民主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因此,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台湾政治文化改造的前景应该是发展“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特别指出“公民文化看来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与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协调的形式。”^①据此解释,可以对其作出这样的归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具有许多不一致的东西又能平衡这些对立特征的文化”。具体体现为多元化政治与较高政治共识的平衡,政治参与的责任感与实际政治参与行为的平衡,政府政治权威与责任的平衡;公民文化还是主张有序变革的政治文化。

首先,“公民文化”是在政治多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认知,并取得较高的政治共识。一个社会的共识十分重要,共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就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基础性的政治共识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法律的认同。阿尔蒙德指出,较成功的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具有一种稳定类型的信仰。从现实经验观点看,较高的政治共识有利于在社会公众之间建立彼此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而人际间的信任与合作态度是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保持一个民主政体运转的一般性途径。

其次,“公民文化”体现了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平衡,即公民既有现代政治的参与意识,同时又在政治认同基础上形成对宪政体制的信任,乃至忠诚。这种政治信任内化为公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行为所具有的自我规制,因此形成有节制的政治参与行为。在其基本权利能够获得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公民参与体现为参与的能力——如通过参加社会组织等渠道进行参与,而非直接诉诸街头政治——“争

^① [美]阿尔蒙德等著 徐湘林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议政治”的行为。

再次,“公民文化”能够解决民选政府的政治权威和责任平衡的问题。在社会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以及公民权利具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公民选择的政府官员便得到合法性的授权,从而有利于政府产生政治效能,有效行使公共管理的功能。被赋予政治权威和具有效能的政府,同时也必然承担了政治责任。

总之,“公民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减少社会政治冲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促进产生具有效能的政府。台湾意欲解决政治文化结构变化以及政治冲突带来的问题,就需要对其政治文化深层结构进行改善。而“公民文化”无疑具有促进多元政治文化结构良性调整、改善政治系统结构性矛盾的功效。

然而,“公民文化”并非通过常规教育、传授、训练所得,更主要的是在政治实践中各种政治力量或政治因素经过磨合、调整而产生的。就促使“公民文化”产生而言,至少需要有以下方面的关键性努力和矫正。

第一,对于政治转型社会而言,尤其需要主要的政治集团(政党)发挥其影响和示范作用。通过其领导者的努力,尽可能弥合政治歧见,以此缓解政治冲突。“精英的行为、选择和态度对他们的追随者处理政治分歧和纷争的方式能产生塑造性的影响。反对党的领导人必须带头达成了解、培育工作关系以弥合历史上的分野,限制过高的期望值和为他们的议事日程建立更加长期的、更加务实的长远视野,分享权力的协议或正式的安排反映的只是这些当务之急中的一个方面。”^①以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阵营之间深层的矛盾结构以及由此衍生出非理性、非道德的政治竞争,波及整个台湾,影响社会建立共识和和谐。虽然这种对抗性的心理情结并非短时间内可以矫正和改变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社会民众对于政党之间的政治恶斗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混乱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要求改善的意愿越来越明显,呼吁政党寻求谅解与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广泛。能够摒弃政党恶斗,主张并带头促进良性竞争的政党必

然在今后的台湾政坛中更占得优势。

第二,通过完善“公民社会”建立社会的理解和包容精神,寻求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基础。台湾政治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公民社会”正逐渐形成。各种组织、专业化机构聚合起不同的社会利益,有效促进其政治表达,并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事务。但是,台湾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些问题亟待解决,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组织机构政治化问题。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对立对“公民社会”的发育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环境。职业化、中立化的社会组织(机构)尚不发达,而作为政党外围组织的团体却不断出现,一部分社会组织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倾向,诸如“台湾独立同盟”、“基督教长老会”等都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它们不是承担弥合政治分歧、矛盾的力量,相反,却充当了岛内政治冲突的砝码。特别是台湾媒体,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其新闻传播功能得以扩大,但是有些却被裹挟在党派政治权力的斗争之中,政治倾向十分明显,被打上“蓝营媒体”、“绿营媒体”的标签。而且,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执行机构,媒体也向社会传播了对抗性的政治立场、态度和情感。此外,台湾社会诸多地方组织(或曰地方派系)是台湾市民社会的普遍形式,然而地方组织卷入政治中捞取政治利益的情况却很普遍。它们都需要找执政党作政治靠山,但政治倾向不确定,谁是执政者就倾向支持谁,由此成为台湾社会政治取向的特征之一。^②总之,台湾的“公民社会”完善之路尚且漫长,市民组织性质需要经历转型,转向更加职业化、中立化、公益化的发展道路上来。

第三,完善法治社会的机能,建立有效解决政治冲突的终端机制。以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弥合社会分歧,建立共识等方式,减少和缓解政治纠纷、冲突,然而,除此之外,还需要具有解决政治纠纷的终端机制,这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功

^① 刘宁军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8页。

^② 高永光文“21世纪台湾地方派系的发展”,<http://www3.nccu.edu.tw/~ykkao/article/21local.pdf>。

能,其中司法的作用尤为显著。从实践看,在一些较发达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效解决政治纠纷的关键在于可能存在多种促进政治和解的因素和机制,诸如政党合作、中间选民的制约力量、社会中立组织的促进,等等。然而,解决政治冲突终端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司法解决机制,构成其解决分歧、促进社会共识的重要方面,并且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司法解决社会政治纠纷的前提是司法公正及为社会信任,这却是台湾社会比较缺乏的。从威权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司法政治工具化的印记,始终是台湾社会对司法质疑的关键;在当下政治冲突严重、政党斗争尖锐化的状况下,某些司法判决的不公正以及司法人员的非职业化行使权力或其道德操守失范情况,更成为社会对司法不信任的理由。从客观情况看,台湾司法不公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比如“3·19”枪击案,其违背专业的审理过程以及无法自圆其说的判决漏洞,无疑是台湾司法政治化的重要案例。然而,“蓝”、“绿”政治分野,使任何涉及政治过程的案件审理都可能引起不同派别之间的诘难。总之,司法地位不能确定,有碍于法治主义原则的确立,有碍于

社会正义的实现。

四、结 语

一个社会对其内在政治结构衍生的矛盾和冲突,缺乏有效处理和解决的机制,无疑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障碍。由于特殊的历史变迁导致台湾政治文化结构被改变,在政治认同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冲突性已经显现,而政治转型之后政党竞争与冲突更加剧了政治文化冲突性特征。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形成势必影响到现实政治参与行动,而解决政治冲突问题必然着眼于政治文化的改善,因此,构建“公民文化”被提出,这是解决政治冲突的根本性途径。构建“公民文化”是复杂的政治实践过程,需要作出的重要努力应该包括通过建立政党良性竞争方式弥合政治分歧,通过完善“公民社会”形成社会政治制约力量,以及通过建立司法公正等建立解决政治纠纷的终端机制。唯由此,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和前景才会更美好。

编辑 薛迎春 罗凤灵

On the Vicissitude of Political Culture Structure of Taiwan and Its Features of Conflict

WANG Wei¹

(1.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aiwan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 characterized by the changes of structural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Taiwanese native political culture. This change was finally culmin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mode of party competition during the early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semination to the society will propagate to the society the hostile mentality and mode of competition formulated for a long time and lead to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aiwan, highlighting the feature of conflict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conflicting political culture will eventually ru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issue of how to reform Taiwanese political culture is being put on the agenda.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al structure; conflicting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transition; compet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citizen culture”